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第二卷)

乔洪武 等著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第二卷)

乔洪武 等著



2016 年 · 北京

本书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攻关项目“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成果,特此鸣谢!

目 录

第三部分 现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上)

第十八章 凯恩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3
第一节 凯恩斯经济伦理思想的背景和渊源	4
第二节 凯恩斯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0
一、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10
二、反对失业有理,主张充分就业	17
三、反对勤俭节约,主张扩大消费	23
第三节 简要评价	27
第十九章 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38
第一节 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39
一、时代背景	39
二、理论渊源	43
第二节 后凯恩斯经济学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48
一、稳定与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	51
二、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伦理之争	60
三、短期与长期的时间哲学冲突	67
四、消费与储蓄的节俭道德悖论	73
五、货币幻象的维持与破灭	80
第三节 后凯恩斯经济学右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86
一、萨缪尔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87
二、莫迪利安尼的经济伦理思想	94
三、托宾的经济伦理思想	98

四、索洛的经济伦理思想	103
第四节 新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107
一、曼昆的经济伦理思想	109
二、费尔普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112
三、阿克洛夫的经济伦理思想.....	115
四、斯蒂格利茨的经济伦理思想	119
第五节 简要评价.....	123
第二十章 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	133
第一节 哈耶克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134
第二节 哈耶克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39
一、自由的善.....	139
二、自生自发秩序的美	145
三、计划体制的恶	156
四、社会公正的虚幻	166
五、民主政治的政治和经济伦理缺陷	177
第三节 简要评价.....	193
第二十一章 制度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234
第一节 凡勃伦的经济伦理思想	235
一、市场制度的文明缺陷	236
二、有闲阶级的道德批判	239
三、“机械操作”取代“企业经营”的道德理想	244
第二节 康芒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250
一、制度的伦理内蕴	251
二、“交易”:经济学与法学和伦理学结合的纽带	255
三、法制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作用	260
第三节 加尔布雷思的经济伦理思想	266
一、富裕社会中贫困问题的伦理关切	267
二、二元体制的道德批判	272

第四节 简要评价	282
第二十二章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294
第一节 科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295
一、科斯定理的经济伦理思想史渊源	295
二、权利界定的斯密基础	300
三、交易成本约束下的权利界定	304
四、科斯定理审视下的理想世界建构	308
第二节 诺思的经济伦理思想	311
一、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	311
二、制度变迁的门阶条件和动力系统	314
三、制度变迁的伦理评价	318
第三节 威廉姆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322
一、人的有限理性和物的资产专用性	323
二、不同治理形式的道德比较和评价	328
三、层级制组织利益追求的正义性	332
第四节 张五常的经济伦理思想	337
一、人性自私的贡献与祸害	338
二、人权与产权的权利界定	341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伦理思考	346
第五节 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	350
一、功利的权利界定:经济权利与法律权利	350
二、权利的价值:功利计算的结果	354
三、功利计算的国家:掠夺者与保护者	357
第六节 德姆塞茨的经济伦理思想	362
一、权利界定的稀缺性与人性基础	363
二、产权的伦理道德评价	365
三、基于效率的财产权利正义理论	371
第七节 简要评价	376

第二十三章 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	389
第一节 森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背景和理论来源	390
第二节 森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396
一、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方法论基础	397
二、超越“经济人”:重建“伦理相关的”微观行为基础	410
三、重建“伦理相关的”社会评价体系:基于“可行能力”的 评价框架	421
第三节 简要评价	452

第三部分

现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上)

第十八章 凯恩斯的经济伦理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1902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数学和古典文学。1906年考入英国印度事务部任低级职员。1908年应马歇尔相邀重回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一方面跟随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另一方面担任讲师，教授关于货币的理论。1911年任马歇尔创办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19年12月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该书立刻使他声名大噪。1929年凯恩斯当选英国皇家科学院经济部院士，1921年出版《论概率》，1930年出版《论货币》。1936年2月4日，其最重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通论》刚一发表，他的经济学入门导师庇古就评价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向月亮开枪的艺术家。不管对他的枪法如何评价，我们都会敬佩他的独创精神。”^①这是因为《通论》深深伤害了庇古。而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通论》为罗斯福的新政提供了理论引擎，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加尔布雷斯说道，到30年代末，罗斯福的主要经济顾问在所有同财政政策有重要关系的部门里建立了一个由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信徒们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很快，年轻一代的英国经济学家也开始了将凯恩斯理论同古典经济学调和起来的工作，其中以约翰·希克斯的IS—LM曲线图最为著名。1940年至1946年，凯恩斯任英国财政部顾问，在“出色的战时预算方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以及对英国对外金融政策逐步的控制”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②1942年6月被英王册封为勋爵。1944年7月代表英国参加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国际会议。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因心脏病再次发作而去世。4月22日，《泰晤士报》上发表讣告。

①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0页。

② 同上书，第640页。

文章称：“如果要找到一位同他的影响同样大的经济学家，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亚当·斯密……”。^① 凯恩斯去世以后不久，熊彼特就撰写了一篇评价文章，他指出，《通论》问世以后取得了持续的成功。“一个凯恩斯学派形成了，而且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史家所说的法国学派、德国学派或意大利学派那样一个广义的学派，而是一个真正的学派，……这还不是一切。在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的范围之外，还有广泛的外围的同情者，……在整个经济学史上只有两个类似的情况——重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本身就是伟大的成就”。^② 虽然他们两人直到 1927 年才首次会面，而且两人的关系，“无论从个人说或从专业说，都是不太密切的。”^③

第一节 凯恩斯经济伦理思想的背景和渊源

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剑桥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曾出版《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方法》(1891 年)，因此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母亲(佛萝伦丝)也是剑桥毕业生，曾任剑桥市长。因此，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同剑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接触。内维尔·凯恩斯 1870 年是作为数学专业的学生考入剑桥大学的，1873 年夏天转入伦理学，在当时这个学科所包含的专业还有道德及政治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虽然当时剑桥的伦理学专业规模不大，但已经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加入，这其中就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内维尔跟随亨利·赛吉维克学习道德及政治哲学，但是他与马歇尔更加接近，马歇尔最先是教数学，后来教道德学，最后转教经济学。马歇尔一直很欣赏内维尔，认为他是他教过的两三个最好的学生之一。他的这一转向为未来的梅纳德·

^①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等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883 页。

^② [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282 页。

^③ [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前言(熊彼特之妻著)，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6 页。

凯恩斯的成长环境奠定了基础。经过三年刻苦攻读,1875年12月,内维尔获得伦理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等的第一名。在剑桥毕业后,内维尔先在剑桥大学做了6年的研究员工作,后任学校考试委员会秘书一职,所以,他们的家就安在了剑桥。剑桥文化对于梅纳德·凯恩斯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剑桥的经济学是与剑桥的道德哲学并肩发展起来的。“穆勒的功利主义、剑桥的数学以及剑桥新教教徒的道德意识是构建剑桥经济学派的主要成分,此学派的创始人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摩尔吸取了剑桥传统中的某些其他特色并以此打造出了剑桥道德哲学学派,一个反边沁主义的学派。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在剑桥孕育长大,但逐渐开始分家,并且再也没有重新回到一起。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生则是在这二者之间曲折前进。”^①

1938年9月9日,梅纳德·凯恩斯在布鲁斯贝利的“回忆俱乐部”宣读了《我的早期信仰》一文,自称自己的哲学观形成于1903年至1906年,即他在剑桥大学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这篇论文的核心是解释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以及这本书对他的影响。1903年10月7日,他在致B.斯威辛班克的信中说:“我一直在攻读穆尔的《伦理学原理》,此书已问世数日——一部令人拍案称奇的巨著,这一学科中最伟大的著作。”^②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凯恩斯再次提到了穆尔,他指出:“穆尔著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划清作为思想状态之属性的善与作为行为之属性的正确二者之间的界限。他还用了一定的篇幅证明一般行为规则的正确性。在正确行为理论中对概率的种种考虑所起的巨大作用,确实是促使我多年来倾全部余暇于这一学科之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穆尔的《伦理学原理》和罗素的《数学原理》的共同影响下从事写作”^③。由此可见,穆尔的伦理思想对凯恩斯的影响极大。

G. E. 穆尔(1873—1958),1892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与罗素等

^①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作者序言,相蓝欣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9页。

^② [英]R. F. 哈罗德:《凯恩斯传》,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1页。

^③ 同上书,第680页。

人交往甚密。1904年至1911年间,他离开剑桥大学致力于研究工作,1911年至1939年,重返剑桥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和讲座教授。由于在剑桥大学任教长达28年之久,使得他在学生中的影响大大胜过罗素。虽然他一生只写过两本专著,一本是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另一本是1912年出版的《伦理学》,而后者是对前者思想的简明通俗本和补充本。但他的著作,被推崇为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开篇,他也被认为是20世纪西方伦理学的开创者。

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穆尔宣称:要创立“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伦理学导论。”^①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各种伦理学之所以缺乏严格的科学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历来的伦理学家们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而又简单的问题,“即没有精确地发现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就试图作答。”穆尔认为,伦理学无外乎一门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学问。因此,“怎样给‘善’下定义这个问题,是全部伦理学中最根本的问题。”^②“美”与“善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表示一种纯“质”,后者则表示与“善的”这个形容词“相适合的东西的整体”。穆尔把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视为一种快乐主义的道德理论,认为它是“最著名和流行最广的”“自然主义谬误”的特殊典型。它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作为目的善和作为手段善之间的界限。功利主义伦理学把公共幸福作为手段善而言,是正确的,但手段善不能等同于目的善。只有当手段善与目的善具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时才有实际意义。那么,什么是“目的善”和“手段善”呢?穆尔认为,“目的善”又叫“内在价值”,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善的内在本性,意味着它作为目的是善的。而“手段善”或所谓“外在价值”则是指本身并不具有善性质但与善事物本身具有某种必然因果联系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达到善事物的手段。进一步来看,对于事物的内在价值的探讨,可以归结为“什么是善的”这一理论问题,而对于外在价值的探讨则可以归结为“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行为是正当的”或“什么是义务、责任”等伦理学实践问题。这样,穆尔通过两类价

① [英]穆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值的区分,将伦理学划分为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两大层次,并将前者归于绝对真理的科学领域,把后者归于经验事实的领域。摩尔的伦理学有四大基石,第一是“善”的概念的不可定义性。所以,任何将“善”与事物的其他特性等同的做法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谬误”。第二是事物的所有内在价值里,价值最高的只能是人的“心态”,而在人的心态里,“人际交往所带来的快乐和对美丽事物的享受”又具有最高价值。第三是人的正确行为应以获得事物发展的理想状态为目标,而这种理想状态又以人的最佳意识状态为准绳。第四是,一些事物就其本身来说可能只有零价值或负价值,但一旦与某些有内在价值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个复合体,其价值要大于“至善心态”本身的价值。这又被称为“有机统一体”理论。

穆尔首次划分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在伦理学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的学说不仅对哲学家圈内的人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深受哲学家圈外的崇拜者——凯恩斯就是其中之一——的高度关注。凯恩斯在《早年的信仰》一文中详述了穆尔的影响。他在谈到穆尔书中论道德义务的那一章时写道:“《原理》中有一章我们并不是一带而过的。可以说,我们接受了穆尔的宗教信仰,而抛弃了他的道德律。的确,在我看来,他的‘宗教信仰’的最大优越性之一就是使道德律成为没有必要——所谓‘宗教信仰’,其义乃指人对自己与终极所取的态度;而所谓‘道德律’,其义乃谓人对外部世界与居间物所持之态度。”^①凯恩斯等哲学家圈外的穆尔的崇拜者认为,穆尔对伦理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的这一原则:“善”是一种品质,其意义是无法确定的。而不可确定性原则产生的结论是:对善的判断取决于每一特定情况下的直观认识。哈罗德谈到,牛津的学者们对这一结论所做的解释与剑桥的大相径庭。在牛津,对它的解释主要依赖于可以称之为传统道德的见解,具体表现了世世代代贤达之士的直觉力;在剑桥,直观原则——被那些后来多年为凯恩斯学术上的密友的门徒——解释为完全可以无所顾忌地重新评判一切事物。事实上,凯恩斯在回首往事时

^① [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4页。

亦承认，“我们属于最后一代乌托邦主义者或有时被称为社会改良论者，他们对道德的进步深信不疑，由于这种进步，人类已经是由可信赖的、有理想的、正派的人所组成，人类在真理与客观标准的影响之下，完全可以摆脱习惯、传统标准和僵化的行为准则的外界约束，从此得以施展他们自己的明智的策略、纯洁的动机和对善的可靠的直观本领。”^①哈罗德评论道，必须承认穆尔的伦理学使不可靠性和可能性等问题，相比主张直观义务的那种伦理学，给予凯恩斯以极大的影响，凯恩斯的某些论证（如《概率论》）就是以穆尔论“感知的对象”一文的论证为基础的。“凯恩斯关于概率应视为一个不可限定的概念的观点是《概率论》之全部论证的基础。毋庸置疑，他之所以深信视此种概念为不可限定的做法是正当的，系由穆尔的威望所致。”^②所以，凯恩斯能与庇古相反，不是只恪守其导师马歇尔以及整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是勇于批判传统理论缺陷，从而开创经济学说的新天地。而这一点，正是他深受穆尔的影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最能证明凯恩斯哲学伦理学思想的是他写于1905年7月至9月之间的“伦理学杂记”。他曾计划写一本“完整的伦理学理论”，在这其中写道：“一本伦理学的论著，我认为应有如下结构：第一，它有两个方面——即假设的和实践的伦理学。假设的伦理学首先关注的是某种半形而上学或逻辑学的问题；……实践伦理学的关注对象是行为。……这一部分可能不如第一部分有意思，但它可能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1)美德的性质和价值；(2)教育的理论与方法；(3)政治的理论与方法；
 (4)利己主义的实际功效和局限性——也就是说，我们将自己看作是目的还是手段的分寸如何掌握；(5)对‘真理第一’原则的例外。”^③

凯恩斯的伦理学研究兴趣恰恰与摩尔对这类关系的处理有关，但他也并不完全赞同摩尔的观点。摩尔宣称伦理学的唯一理性的目标是改善整个人类群体的心态。凯恩斯反驳道：第一，“既然我们没有机会去直接检验别

^① [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692页。

^③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6页。

人的心态,怎么可能断言何种方法能够增加人类群体的至善因素呢?第二,摩尔对于牺牲个人的利益去造福全人类的献身精神,没有提供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凯恩斯在1906年一篇题为《利己主义》的论文中问道:“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自己的终极目标吗?难道说一个人应该将自己变坏(此处指参与政治),为的是改善他人的心态?”^①

在另外一方面,虽然凯恩斯在中年以后仍宣称接受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的基本直觉:“我们是这一代中唯一的一批能够逃离边沁功利主义传统的人。”^②但至少在他早年仍然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04年作为剑桥大学英文写作竞赛获奖的论文《爱德蒙·伯克的政治原则》中,凯恩斯赞扬伯克是第一位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他认为伯克的“最大幸福原理”是政治的,而不是伦理的。伯克的政治功利主义还反对英国当时威胁北美殖民地的做法,凯恩斯认为仅就这一立场,伯克就应该跻身于“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之列。^③

1908年之前,凯恩斯对经济学还只有断断续续的兴趣。辞去印度事务部的工作返回剑桥大学之后,才在马歇尔手下边干边学。1911年10月,凯恩斯被任命为《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12年入选“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该会创立于1822年。从此开始,凯恩斯的经济学训练大有长进。当时,他仍是他老师的忠实信徒,即他同意马歇尔的观点,在现存的法律和机构的框架之内,让市场来主导经济才是安全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保持贸易自由。与此同时,他与属于历史学派的福克斯韦尔关系也很密切。凯恩斯非常敬佩他攻击传统观念的精神和写作风格,也喜欢他的藏书癖和手工艺品的热爱,“一句话,福克斯韦尔的价值观对凯恩斯的吸引力大大超过了马歇尔。”^④当马歇尔退休时,在1908年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选举中,尽管历史学派的福克斯韦尔和阿什利的资历更深,马歇尔还是不遗余力地支

^①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6—127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

^④ 同上书,第164页。

持了资历最浅,但方法论与自己一致的弟子庇古,帮助他成功当选。他当然不会允许这门由他创立的新学科重新回到历史和制度主义者的手中。凯恩斯与“教授”庇古的关系友善但从不亲近,他们两人从读本科时就已认识。虽然庇古在 30 岁即被任命为教授,但是连凯恩斯的父亲都认为,凯恩斯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庇古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位置。^①

第二节 凯恩斯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生正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大衰退、大动乱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打翻在地,加深了英国的衰落,加强了美国的力量,却丝毫未解决 1914 年以前出现的种种内在矛盾,反而打开了一段长时期经济危机的大门。从 1920 年 10 月开始,英国物价开始大跌,失业率大大上升。此后 12 个月里,总产值下降了 15%,而失业率上升了 22%。到 1923 年 7 月,英国的失业大军多达 130 万人,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 11.4%。这一危机虽然在 20 年代仍然掩盖着并以多种局部形式出现,如英国在整个 20 年代一直有 100 多万人失业;但是从 1929 年中期起,潜在的危机终于像火山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爆发。在著名的“黑色星期四”,即 1929 年 10 月 24 日,纽约股市暴跌。从 1929 年 10 月至 1933 年 1 月,美国 30 种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每股下跌了 82.8%;20 种公用事业股票价格平均每股下跌了 80.3%;20 种铁路股票价格平均每股下跌了 84.4%。1930 年 5 月和 10 月,华尔街股市又两度崩盘。到 1933 年,美国的破产企业达 14 万家以上,倒闭银行 6000 多家,有 1400 万人失业,美国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

^①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凯恩斯传》,相蓝欣等译,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65 页。